

省会大学扩容： 地方高校新向往？

■本报记者 陈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年来，高校将办学触角伸向省会或省内大城市的现象正在逐渐增多，而这一现象也在悄然改变着我国高校的整体布局。

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大背景下，省内地方高校为何开始向往“省会生活”？欧美国家的“大学城”模式是否可以借鉴？对于那些依然坚守在非省会城市的地方高校而言，发展之路又在何方？

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河南大学主校区的所在地，正是20世纪初中国科举考试终结地——河南贡院。该校区的近代建筑群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贡院位于古都开封。在这里，河南大学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并建立了两个校区。不久前，河南大学在庆祝建校109周年校庆之际，又正式启用了它的第三个校区——龙子湖校区。不过，这个校区不在开封市，而是在距离开封不到百公里的河南省会郑州。

这意味着，河南大学由此成为一所非省会城市的高校。有人将这类高校称为“省会大学”。如果回顾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布局变化，会发现如河南大学这样将自身的办学触角伸向省会或省内大城市的大学在逐渐增多，而这一现象也在悄然改变着我国高校的整体布局。

被向往的“省会”生活

实际上，今年以来，向省会城市搬迁的高校并不止河南大学一所。

8月26日，山西师范大学在其官网发布一则《山西师范大学医学院招聘人员公告》。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公告招聘的学校医务人员工作地点并不在山大此前的校区——山西省临汾市，而是变成了省会太原。这标志着盛传已久的山西师范大学整体迁址太原一事尘埃落定。

此前，早在2019年，原本位于晋中市的山西农业大学便和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合署改革，合署后改名为“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并分成了晋中、太原两大校区。在合署改革一年后，山西农业大学将其注册地也变更为太原市。

在华北地区，石家庄市今年7月发布新闻，提及要推动河北工业大学在石家庄建设研究生培养基地。8月2日，河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伴随着这些动作，河北工业大学回石家庄的消息刷爆河北人的朋友圈。

在安徽省，安徽师范大学今年1月已经与合肥市人民政府达成合作意向，拟将位于合肥的肥西师范学校建制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办学半个世纪的安师大由此成为“省会大学”。

为什么这些原本在非省会城市发展的地方

高校，开始“向往”省会生活了呢？

在长期关注国内高校布局的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国瑞看来，国内很多高校建在非省会城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先是在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阶段，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企业、高校共生的现象，这一点在东北地区非常明显。”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国瑞表示，在“大三线”建设时期，出于国防需要，我国在大后方建设了一些与国防工业等相关的高校；“文革”期间，由于中央推行面向工农办学等措施，一些高校也被迁往偏远城市并再未能回到省会城市。此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曾兴起一场市办大学风潮，导致许多地级市也兴办了高校。

这些举措几乎全部出于政府的调控需要，而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需求决定大学的存在价值，资源决定大学能否生存下去，由需求和资源等构成的空间则决定一所大学在体系中是否具有独立位置。”刘国瑞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上述因素通过政府的调控能够达成平衡状态，加之各地区之间收入等差距不大，城市对大学生存发展的影响不是特别突出。因此，在政府的统筹规划和计划调控下，各地形成了城市、产业与大学的稳定关系。

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调控方式的调整，在有些地方，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

已破坏的要素平衡

在采访中，记者粗略统计了太原与临汾、郑州与开封两组城市近4年来的GDP变化。结果显示，2017年~2020年，太原市每年的GDP分别为3382亿元、3884亿元、4028亿元，以及4153亿元；相比之下，临汾市每年的GDP大致为1320亿元、1440亿元、1452亿元，以及1505亿元。如果将两地GDP逐年相减，会发现四年间两地的GDP总量之差从2062亿元上涨至2648亿元。

相较于太原与临汾，郑州与开封的差距更加明显。经粗略统计，4年间，两地的逐年GDP差额从2017年的7195亿元上涨至2020

年的9632亿元。

“地方高校向省会迁移现象主要出现在新世纪，其背景便是国内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拉大，高等教育在省域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此，刘国瑞分析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提高，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需求、资源和空间三要素的平衡已被打破，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受区域环境的影响。

受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也表示，目前除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而在目前一流建设以及各种排行榜的驱动下，地方高校希望能够在更有天时、地利的环境中办学，所以高校向省会城市迁移也就顺理成章。“谁当校领导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内生动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就在山西、安徽等地的高校纷纷要挤进省会城市的同时，在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一场几乎是相反的高校布局也正在推进。以广东省为例，目前该省正在强力推进在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省会城市布局建设高校。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该省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强粤东西北地区高校建设，采取多种支持方式，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下沉到中等城市和产业集聚区。

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玉平看来，广东地区与安徽、山西等地的情况，恰恰代表了我国高校目前在一体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的两个不同阶段。

崔玉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上世纪末，最初是以“大学城”形式出现的。然而，这种形式只做到了将高校在物理空间聚在一起，更像一个高校“聚集区”，并没有起到“一体化”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伴随着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高校也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对于国内大部分省城来说，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目前还处于‘高低聚集’的空间状态，空间集群效应依然占主导地位，而对于发达的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它们已经处于‘高集聚’的空间状态。”崔玉平表示，这些地区已经由高校空间集群阶段向一体化阶段迈进。此时，辐射、扩散和溢出效应开始占据主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高校开始向周边扩

张。“不过，这只出现在国内的少部分地区。”

应重视的财政杠杆

谈及如何看待目前高校纷纷向省会城市迁移的现象，受访专家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正如崔玉平所言，“如果站在高校和地方政府角度，我赞同这种迁移，毕竟通过这一方式，高校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各种资源，地方政府也可以就此聚拢更多人才。然而，如果站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空间布局角度，这种现象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的均衡分布”。

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别敦荣曾概括过普及化阶段的一些特征，其中就包括公平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过程，在于逐步让所有适龄人口均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公平特征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仍有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大致包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学生，以及因自身原因没有机会接受完整基础教育的学生。”该文指出，以上人群中大多数处于偏远农村贫困地区。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解决这些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彰显普及化高等教育重视公平的特征。公平程度越高，高等教育越发达。

显然，高等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中心城市，并不利于上述人群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别敦荣说，以临汾市为例，当山西师范大学迁走后，临汾当地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足问题，是否还需要重新建立高等教育体系？而一旦“重打鼓另开张”，其耗费的资源是否会更多？而新建高校要达到现有高校的办学水平，则所需时日一定很长。

既然如此，地方政府又该如何作为？

“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可以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财政拨款上给予非省会高校更多支持。”别敦荣坦言，因为相对而言，非省会城市政府缺乏资金，也没有省会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只有增加投资，才能保证非省会高校具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公共财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非省会高校与省会高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前者的迁移动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很自然的。”

而在目前地区间高等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心态却往往是“扶强不扶弱”，即更多地扶持具有一定实力，乃至可以冲击“双一流”的地方高校。某些非省会地方政府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扶持本地区高校的政策，如镇江市“十四五”规划表示支持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创建“双一流”大学；新乡市“十四五”规划支持河南师范大学争创“双一流”建设，但这些地方数量相对较少，且基本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杠杆，政府要用这个杠杆对不同区域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调配。”别敦荣表示，过于平均分配资源自然不能形成合力，但过分强调“扶强不扶弱”，也会导致不同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差距过大，这其中的平衡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尚缺乏的高教土壤

在专家们看来，地方高校向中心城市迁徙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国内知名高校的校址几乎全部在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普通的地方城市很难发展出高水平高校。

今年4月，上海软科发布了2021年软科中国大学榜单600强榜单，在排名前50位的高校中，位于直辖市的高校有18所，位于省会城市的高校有28所，其余4所高校分别是位于厦门的厦门大学、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位于大连的大连理工大学，以及位于苏州的苏州大学。

与之相对的是，国外有大量知名大学在某个小镇上发展几百年，最后与小镇密不可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大学城模式”。如英国剑桥大学位于乡间集镇剑桥，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只是位于小城伊萨卡……

(下转第6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十几年前，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就在一些名牌大学进行试点；十几年过去了，进展并不快，规模占比也相对有限。但是，近两年来，它的发展似乎开始呈井喷之势，有的大学甚至在博士研究生招考中施行全员“申请—考核”制。

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就像是突然取消高考，人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公平问题。从8月31日《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刊登的《中考制博士生招生中的“选择题”》一文看，导师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给全部有意报考的学生面试的资格和机会，教育制度研究者则主要关心程序规范。前者体现导师对招生自主权的渴望，而后者则属于制度把控。

在招收研究生的问题上，导师自主权与管理规定间一直都在博弈。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研究生尚处于恢复招生的阶段，有资格招生的导师多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自主权是比较大的。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以及导师规模的扩大，自主权反而在逐渐缩小。这反映出导师通过学术威望形成信用时代的结束。

多数导师的个人信用不再受到重视，制度的威力就会凸显。管理者加强导师管理，削减导师自主权的依据正在于此。然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在监督和辅助服务上，起直接和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导师。换言之，任何管理制度和政策都要以提高导师积极性、保证学术水平高的导师上岗为原则，才能切实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现在的问题是，管理制度越来越详尽，且层层细化，但真正有志于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导师的比例却越来越小；而随着“教学”概念的泛化成为时尚，导师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

最近几年流行的针对导师上岗资格的每年申请制就是一例。以往的导师上岗资格考核的是学术水平，达到标准即为导师。现在就需要每年填表申请，而唯一重要的指标，就是手头要有在研“项目”。虽然对理工类的导师而言，“项目经费”有其重要性，但没有谁认真评估“项目经费”托举出的科研成果水平与经费数量之间的匹配程度。而文科导师则主要是把承担“项目”当成学术地位的标志。无论是哪种情况，落实到招生条件和资格都是一样的，即有钱就可以招(研究生，钱多则可以多招。这种公司化的“组团”管理方式，其本身对于研究生培养是否适用，值得反省。

一个是“请”老师当导师，一个是老师自己申请当导师，哪种情况让导师感觉到尊重不言自明。而没有受到尊重的导师招收研究生，不过是为了自己完成科研项目，或替自己的公司打工，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

公平没有得到保证，质量却在下降，这样的研究生教育也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实行和推广，看起来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实际上也是对近年来实行的相关政策偏向的纠正。

在个别学校的试行阶段，因为本身就是“优中选优”，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特色，并没有真正凸显出来。以笔者的实际观察，大部分有幸中榜的博士生与考试选拔出来的没有多大区别。一些个性突出、科研能力强的“专才”“偏才”并没有因此受益。

这中间当然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一年一度的导师资格申请制让导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变弱也是重要原因。因为按照该办法，导师不会认为学生是自己的，可以传承自己的学术思想，反而会认为学生属于学校、院系或某专业方向。因此，只要学生通过答辩或抽检过关，拿到学位证就算完成任务。在这种管理方式下，极少有导师甘愿拍着胸脯豪言：“这学生我招了，相信他有能力成就未来！”

当然，目下研究生的生源也在发生变化。“应试”教育不仅在中小学，在大学也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个个“应试人才”中发现有发展前途的“专才”“偏才”已非易事。各位导师对学术的见解和对“专才”“偏才”的认知也千差万别，一旦无法达成共识，可能形成相互消耗的结局。

但从考试选拔制转向“申请—考核”制总需要有所不同。“申请—考核”制既旨在扩大导师招生和培养上的自主权，就应该给导师更多的发挥空间，展示其个性和创造力，这也是重振信心和重建责任感的基础。

博士生未来主要面向学术研究，那就让博士生培养去芜存菁，回归学术的轨道之上。

由博士生申考制想到导师资格申请制

通识教育大家谈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通识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解决专业教育所带来的知识与技能单一的问题，适应新时代对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以及现代社会复杂性对人才素质所提出的新要求。通识教育质量的好坏事关人才培养质量，正在成为衡量一所高校教育品质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可以说，由重视专业教育转向重视通识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转向和必然选择。

“通”“专”关系是关键问题

在国内高校，专业设置基本上遵循学科逻辑，以交叉学科或多学科为支撑的专业数量偏少；而课程设置往往又偏重于单学科的专业课

程，不注重跨学科课程，这就割裂了专业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使得学生知识结构存在很大的欠缺，难以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与能力。

该现象迫切地需要加强通识教育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加强通识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全球视野、人文关怀、思维能力、批判精神，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增进其发展潜力，亦即拓展学生的多学科知识与实践能力，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和就业创业奠定扎实的基础。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推进通识教育过程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专业教育一般是依据专业发展要求和行业分工要求设置的，而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如果说专业教育提供的是具体专业领域的深度教育，通识教育则注重多学科或多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融通。

加强通识教育，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受教育者就能够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分析方法和认知能力，养成独立思考、客观分析的自觉性，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成为“通”“专”结合、富有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转向通识是必然选择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指向存在很大差异。专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单一、聚焦式的教

育手段，培养某一具体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一定程度上说，专业教育训练的是一种谋生技能，它要解决的是人的自然生存问题。而通识教育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要培养的是学生的理想信念、人文情怀和社会操守，解决的是人的社会价值问题，也就是如何活着更有意义的问题。

由重视专业教育转向重视通识教育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转变。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且人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人思考、有思想、有精神。单个个体的人的延续问题，实际上也是通过作为群体的人的延续来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受教育者明白自己作为个体需要对人类社会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进入新时代，就中国面临的问题而言，简单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的价值追求由此也将发生重大转变。追求成为更全面的人，不仅具备了更充分的社会条件，而且成为社会对人的更高要求。中国高等教育适应这种变化，由重视专业教育转向重视通识教育，是一种必然选择。

技能型人才不再是高教目标

与传统社会相比，复杂性是现代社会的主体特征。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人类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现代社